

錢穆《中國經濟史》2

錢穆在《中國經濟史》中指出，周代封建時期，八家共耕一井的「公田」與各家自耕的「私田」並行，農民先耕公田，再照料私田。鐵器發明、牛耕推廣、水利工程在西門豹、白圭、李冰手中次第展開，原先井字形的格子線再也束縛不住墾荒的慾望。商鞅「決裂阡陌」，把井田的阡陌封疆徹底剷平，土地從此可以買賣。「自實田」一出，秦始皇把土地私有制烙上了合法印記。

隨之而來的連鎖反應暴烈而迅猛：土地可以買賣，自耕農淪為佃農；佃農愈多，田租愈重，農民逃亡，戶籍崩壞。漢代的限民名田、王莽的王田制、北魏的均田制，逐一登場，每一次都聲稱要「復三代之治」，每一次都被反噬。唐代租庸調製是其中設計最精緻的一環，「有田則有租，有家則有調，有身則有庸」，政府給農民授田，再向農民收租。安史之亂打爛了戶籍，府兵制瓦解，流民四散，租庸調製的物質基礎蕩然無存。宰相楊炎推出兩稅法，「把稅收從「認丁」轉為「認資產」。

明代一條鞭法把田租、力役、人口稅合併，按田畝攤派，丁糧合一。清代「攤丁入畝」，丁稅徹底消失，攤入田賦之中。每一步都在修正前一步，每一步又鑄造新的不平等。田少之家多派，田多之家少派；富商可以藏貨匿產，農民只能坐吃田租。唐代宰相陸贄的判斷穿越千年，仍然準確：富者兼地數萬畝，而貧者無容足之居。

回望這場接力，井田崩於格子線被撬開，均田敗於豪強兼併，兩稅毀於資產評估失準，一條鞭卡於南北經濟斷裂。土地從未真正回到種它的人手中。

中國經濟史

作者：錢穆

出版社：中國計量出版社

西漢時代經濟大辯論的核心，源於一道根本問題：人之逐利，是天性還是罪行？司馬遷的回答極為坦蕩。他認為追求財富，是私有社會中每一個人的社會本能。他替商人辯護：「富者，人之情性，所不學而俱欲者也。」在他眼中，最高明的治術，是順應人性的逐利衝動；最拙劣的，則是政府親自下場與民爭利。農、虞、工、商四業，一視同仁。只要水大，魚就多。背後的判斷很簡單：人的慾望擋不住，不如讓它流。

董仲舒的回答走另一條路。他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說道：皇皇求財利，常恐乏匱者，庶人之意也；皇皇求仁義，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大夫之意也。經營商業與手工業的人，皆為庶人，必須以禮教化。限民名田、為人民佔有土地設立最高限額，廢鹽鐵官營、薄賦斂、減徭役，否則富者田連阡陌，貧者無立錐之地。背後的判斷也同樣簡單：人的慾望是危險的，必須馴服。

錢穆在《中國經濟史》中點出，這兩種思想決定了漢武帝朝以後中國兩千年的政策擺動。軌物主義與放任主義，國家統制與自由市場，儒家的「齊之」與法家的「因之」。每一次王朝危機，都會把天平推向董仲舒那一端，每一次經濟復甦，又會把天平推回司馬遷那一端。鹽鐵官賣、均輸平準，是董仲舒路線的延伸與放大；罷鹽鐵、減稅賦、開關梁，又是司馬遷路線的回潮。錢穆把這道鐘擺的頻率寫入書中。

中國經濟史

作者：錢穆

出版社：中國計量出版社

杜君立《新食貨志》1

杜君立在《新食貨志》中寫道：「《新食貨志》從東方的絲綢開始，到東方的鏢局結束，兜了一個漫長的大圈，來講述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如何被那些很細微的商品所撬動。」杜君立是獨立歷史作家，不屬於任何學院體制。他以二十一種商品為線索，從絲綢到石油，串聯起一部全球史。全書寫的是胡椒、茶葉、棉花、煤炭。揭示這些微不足道的東西，如何改變世界。

杜君立指出，在遠古時候，絲綢成為東西方之間交易的第一座橋梁。絲綢的輕逸與光澤讓掌握權力的上層人士感覺專貴，這種來自東方的軟黃金自然而然地成了全世界盛行的奢侈品。「絲綢之路」因而誕生。

羅馬帝國為絲綢支付的白銀數量，足以動搖國庫。絲綢從長安出發，經過河西走廊，穿越中亞，抵達地中海。沿途每一個轉手的中間商都抽取利潤。這條路上的利潤鏈，催生了撒馬爾罕、巴格達、君士坦丁堡等商業都市。

絲綢、瓷器、茶葉，是中國輸往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三大商品。它們改變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，也改變了西方的社會構成。基於這三種日用物，西方發展出享樂型社會。杜君立稱之為「消費的民主」：有好東西，大家都能廉價地享受起來。這種慾望，比少數有錢人的資本擴張更能刺激西方人對全球市場的渴望與開拓。商人階層取代封建領主成為社會主流，整個社會不再圍繞幾家王室運轉，而是所有人服務於面向東方的貿易。絲綢開啟了東西方長期的經濟聯繫。

新食貨志

作者：杜君立

出版社：中信出版社

杜君立《新食貨志》2

在《新食貨志》中，杜君立將白銀視為世界輸入中國的奇特商品。白銀之於古代的中國人，「簡直就如老天賜給民眾的救兵」，把可靠的、不受皇權左右的貨幣帶入東方世界，以抗衡「大政府」動輒濫發貨幣的衝動。

十六世紀，西班牙從美洲掠奪的白銀經馬尼拉進入廣州。杜君立描繪了這條供應鏈：白銀從外國湧入中國，江南城市經濟規模隨之擴大，從農村和鄰省吸納勞動力。這些人口變得比以前富裕，逐漸放棄粗糧，改食稻米。農民改種稻米，棉花種植在江南擴張，紡織業勃興。市鎮繁榮，商人階層崛起，市民文化從晚明的蘇州散播開來。白銀讓封閉的農業社會出現了裂縫。

同一種金屬，同時在撐起地球兩邊的帝國。西班牙用美洲白銀支付軍費，維持哈布斯堡王朝的歐洲霸權。中國明朝用流入的白銀貨幣化稅收，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把田賦、徭役、貢納合併為白銀繳納。兩個帝國都上了白銀的癮。

白銀流向逆轉的那一天，一切開始崩塌。明末白銀進口銳減，政府收不到稅，軍餉發不出，陝西驛卒李自成失業。西班牙的銀礦也逐漸枯竭。兩個帝國幾乎在同一時間因白銀斷裂而崩塌。杜君立寫道，「打開《新食貨志》，看到古人為了保守絲綢、香料和咖啡的秘密而煞費心機，不禁讓人會心微笑。歷史不喜歡秘密，因為人類追求的是智慧。」

新食貨志

作者：杜君立

出版社：中信出版社

杜君立《新食貨志》3

杜君立在《新食貨志》中追溯了鴉片的變異軌跡。這種罌粟的提取物，在古代中東和中國的醫典裡，是止痛、安神、治痢的方劑。它在絲綢之路上以藥品的身分流通了上千年。阿拉伯醫生用它處方，中國的華佗用它配製麻沸散。

杜君立寫道，中國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求於西方，為了抗衡貿易的逆差，「鴉片」這種毒品被英國殖民者作為平衡收支的毒藥，大量輸入中國，暴力地把一整個現代生產、生活和社會制度「砸」向古老的文明。

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強制推廣罌粟種植，以殖民手段壓低收購價格，再經由走私網絡傾銷到廣州。從藥品到毒品的轉化，不是自然發生，是一套精心設計的商業工程。鴉片成為英國平衡對華貿易逆差的工具，每年數千箱的黑色膏體從孟加拉運往珠江口，換回白銀。

杜君立以商品史視角解剖這場變異。鴉片的利潤養活了東印度公司的整個殖民體系。而大清的財政能力，在鴉片煙霧中一點一點瓦解。白銀外流，銀貴錢賤，底層農民的負擔成倍加重。這種植物，在帝國的商業工程下，變成了武器。拖垮了延續兩百年的清朝財政根基。

杜君立在全書中反覆強調，商品從不僅僅是商品。沿著絲綢之路，佛教和伊斯蘭教傳入中國；沿著海上絲綢之路，歐洲傳教士來到東方；商品有限，文化影響則無遠弗屆。

新食貨志

作者：杜君立

出版社：中信出版社